

中苏分裂与中蒙关系 (1960 - 1966)

陈 弢

摘要: 六十年代初以来, 中苏分歧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扩大, 而蒙古党选择坚决站在苏共一方, 反对中共。中国为了分化蒙苏关系和争取蒙古的支持, 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对蒙古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但这些措施却促使蒙古进一步向苏东阵营靠拢。尽管双方都曾想在意识形态争论的同时维持国家关系领域的合作, 但由于彼此之间信任的消逝和矛盾的增加而没有成功。蒙古外交政策在中苏分裂背景下具有一定的主动性, 而并非一味受苏联控制。

关键词: 蒙古; 中苏分裂; 中国; 苏联

中图分类号: D6;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 5574 (2015) 04 - 0083 - 13

DOI:10.16012/j.cnki.88375471.2015.04.007

六十年代初期以来,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所有国家都需要应对国际共运中愈演愈烈的中苏分裂。而与同处亚洲的北越和朝鲜不同, 蒙古人民革命党几乎从一开始就选择站在苏联阵营一方反对中共。1967年苏军正式进驻蒙古, 蒙古成为“苏联在亚洲最好的朋友”, 而与中国则成为了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关系上全面对抗的敌人。

冷战结束以来, 随着前苏东阵营国家档案材料的陆续解密开放, 国际冷战史学界已经出现了一些利用这些国家的档案材料进行研究的优秀著作。但这些著作主要是从蒙古或苏联的角度出发进行论述, 对中方的政策并未做过多描述^①。而2004年中国外交部档案开放之后, 中国学者利用这些材料, 从中方的立场研究了中国建国后至“文革”前的中蒙关系, 从蒙古主动、中国只是被动应对的分析结构来解释中蒙关系在六十年代的恶化过程, 并认为泽登巴尔等蒙古党政高层完全受制于苏联, 是苏联的傀儡^②。这样的分析结构和结论毫无疑问存在巨大的逻辑问题。近年

作者简介: 陈弢, 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助理教授, 柏林洪堡大学历史研究所访问学者 (上海200092)。

① Balazs Szalontai, *Tsedenbal's Mongolia and Communist Aid Donors: a Reappraisal*, IIAS Newsletter # 35, November 2004; Sergey Radchenko, *The Soviets' Best Friend in Asia: The Mongolian Dimension of the Sino - Soviet Split*, CWIHP, Working Paper, No. 42, Washington, D. C. November, 2003.

② 石绍湘 《中蒙关系分析 1949 - 1965》, 外交学院 2010 年硕士论文; 扎雅 《蒙中友好关系述论 (1949 - 1966)》, 吉林大学 2014 年硕士论文。

来中国学者开始考察中蒙关系中的援蒙工人和边界问题,但仍缺乏结合意识形态争论和中苏分裂对中蒙关系影响的考察^①。

本文主要利用笔者收集的中国外交部档案、民主德国外交部档案^②和国内外组织翻译的苏蒙档案等一手材料,同时借助已出版的相关当事人回忆录、年谱和国内外已有的研究著作,以更具国际史的多边视角,来考察六十年代中前期中苏分裂背景下中蒙关系的发展。

—

1950年代是冷战期间中蒙关系的黄金年代,双方不仅作为同属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建立了彼此之间的外交关系,还签订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协定。而随着1960年以来中苏意识形态争论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公开扩大,中国和蒙古的关系也日益恶化。

为了在这场斗争中获得其他兄弟党的支持,中苏竟相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而在东亚地区,蒙古和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成为了双方争夺的重点。尽管国内发生了大饥荒,但中共仍然给蒙古提供了巨额援助。1960年5月底周恩来访蒙时,同蒙方签署了经援协定。其中包括两亿卢布的低息贷款以及1960至1965年间在蒙古援建10项工程等。而为了争取蒙古,苏联也加大了对蒙古的援助。同年7月28日,在苏联访问的蒙古党第一书记泽登巴尔与刚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勃列日涅夫进行了会谈。9月9日,苏蒙在莫斯科签署协定,苏联给予蒙古6.15亿卢布的贷款,帮助蒙古搞15个工业项目。而从1961到1965年,苏联将继续供给蒙古农业机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以进一步增强蒙古畜牧业和农业的生产发展。此外苏联还同意蒙古延期偿付在1961至1965年应该偿还的2.45亿卢布的贷款^③。

尽管提供了巨额援助,但相对于苏联更为强大的援助,此时中国国内的大饥荒让蒙古对中国发展模式信心大减。在大饥荒期间,蒙古甚至还向中国援助了数量

① 谷继坤《中国工人“赴蒙援建”问题的历史考察(1949-1973)》,载《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4期; Zhihua Shen & Julia Lovell, “Undesired Outcomes: China’s Approach to Border Disputes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Cold War History*, 2015, Vol. 15, No. 1, pp. 89-111.

② 这批民主德国外交部档案对本文的写作具有重要作用。六十年代以来,蒙古将与民主德国的关系视作仅次于苏联的关系,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而中国一直将民主德国视作其区别对待政策的主要对象,与民主德国在意识形态争论的同时,在国家关系的一些领域上继续着合作。中国把民主德国视作东欧国家里与中国关系“仅次于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国家(而毫无疑问,这两国都是长期游离于苏东阵营之外的国家)”。所以,民主德国往往可以从蒙双方那里获得其他东欧国家难以获得的消息。民主德国与中蒙官员的谈话以及其驻中蒙越使馆的分析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六十年代中蒙关系的独特视角。

③ 《四十年来苏联给予蒙古的援助》,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 106-00263-01(1),转引自石绍湘《中蒙关系分析1949-1965》,外交学院2010年硕士论文,第40页。

众多的动物肉类。同时,也有包括汉族和蒙古族在内的大量中国公民逃到与蒙古毗邻的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地区避难。1959至1960年,由于大量受灾民众流入定居,阿拉善左旗人口猛增,1960年人口总数达62 927人,比1958年增长78.0%。其中蒙古族13 491人,汉族45 064人^①。内蒙古难民中的一些人还逃到外蒙古,表示愿意加入蒙古国籍,并给蒙古政府提供了第一手有关中国饥荒的情报^②。1961年民主德国驻蒙使馆进行的调查发现,当时中国援蒙工人在蒙古的生活条件要比在中国高很多。有中国工人表示,“中国国内的工人日均只有不到500克的食物供应。在蒙古工作不会挨饿,而且还有机会可以买到一些工业产品”^③。

在这样的背景下,蒙古开始在其国内消除中国建设模式,同时也更加注重对苏联经验的学习。1961年9月底,中蒙友好节开幕,但蒙古的报道却对中国的“三面红旗”避而不谈,在报道中将“大跃进”改成“大发展”,“人民公社”改成“农业合作组织”或“人民合作社”,“总路线”改成“路线”。中国发往蒙古的书籍也需要通过审查。与此相比,蒙方却同意苏联驻蒙使馆增发蒙文版苏联画报,扩大苏联电影宣传,还将苏联制作的蒙语宣传片送到乡下放映^④。

在国际共运内部的争论中,与苏联阵营内的民主德国^⑤、波兰等国共产党出于自身利益而不打算彻底同中共闹僵、因而在中苏分歧中留有余地不同,蒙古党和政府在国际共运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全方位地反对中共的相关政策,并将中共刻画成一个反对和解和谈判,到处制造分歧和冲突的党,是国际社会主义阵营混乱的根源。1961年11月22日,蒙古外交部长沙格达苏仁对民主德国官员指出,“阿尔巴尼亚对我们来说一点也不危险,中共对其的全面支持才是最值得担忧的”。他还认为,在德国问题上,“中共希望欧洲最好通过爆发一场公开的武装冲突来解决这个问题”,而蒙古的态度则一如既往,希望德国问题和平解决^⑥。此外,与北越和朝鲜等东亚社会主义国家不同,蒙古也并未转载中共有关纪念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成立20周年的文章^⑦。

蒙古党早在苏共对来自中方的指责举棋未定之时,就建议苏共强力回击中共。1963年9月17日,即中共发表九评中的前两评之后,蒙古驻华大使告诉苏联官员,要求其“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该忽视把中共领导人当作敌人的重要性,中共早

① 参见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官网: http://www.alszq.gov.cn/news_view.asp?newsid=2895, 引用日期: 2014年7月7日。

② “契尔沃年科与策伯格梅德会谈记录: 中蒙边界谈判问题”, 1962年10月17日,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中苏关系》第九卷, 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 第402页。

③ Brief vom Speiser an Gen. Winzer, Ulan - Bator, 22. 11. 1961, 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s (PAAA), MfAA, C247/74.

④ 石绍湘《中蒙关系分析1949—1965》, 外交学院2010年硕士论文, 第40—41页。

⑤ 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对苏联的依赖程度来看, 民主德国要远甚于蒙古。

⑥ Aktenvermerk über die Unterredung mit dem Minister für Auswärtige Angelegenheiten der MVR, Gen. Schagdarsuren, am 21. 11. 1961, Ulan - Bator 22. 11. 1961, PAAA, MfAA, C247/74.

⑦ Brief vom Speiser an Gen. Winzer, Ulan - Bator, 22. 11. 1961, PAAA, MfAA, C247/74.

就在掩盖其想同莫斯科斗争的意图”，“即使赫鲁晓夫倒台，中共也不会停止同苏共的斗争，而会改变斗争的方式和策略”，“无论如何，中国想成为唯一的中心”，所以，“现在就需要对中共展开大规模的意识形态回击”^①。

二

蒙古党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上，事实上面临着一种矛盾。一方面，蒙古作为地广人稀、生产力水平发展不足的国家，需要借助中国提供的经济、物资援助，尤其是劳动力援助来发展蒙古，实现蒙古党把蒙古建设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蓝图。而另一方面，蒙古与中国在历史和传统上存在着巨大分歧，蒙古民众中存在着反华民族主义思潮，中蒙边界也并未划定。在双方关系友好的五十年代，这样一对矛盾还可以或多或少地被掩盖。但到1960年后，如何处理这样一对矛盾成了双方共同面对的问题。当时蒙古当局对于处理同中国的国家关系，还是相当谨慎的。对于已经发生的中国援蒙工人和两国边境的问题，都未向蒙古公众告知^②。

援蒙工人问题是中蒙之间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中蒙两国分别在1955年和1960年签订的两个有关派遣工人参加蒙古生产建设的协定，到1964年为止，中国共派出1.8万多名各个工种的员工到蒙古帮助当地人从事生产建设，平均每年保持在7000人左右，最多的年份曾达1.2万人。这些人分散在蒙古的建筑、公交、农牧业等20多个部门，200多个企业，足迹遍及蒙古全部18个省和首都乌兰巴托市^③。中国工人为蒙古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按照五十年代双方达成的相关协议，中国工人除了要遵守蒙古的法律和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外，在援蒙期间每月只能汇不超过基本工资的30%的款项回家^④。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对蒙古党高层指出，违反蒙古法律的中国员工都应该按蒙古法律法办，“替中方教育人民中方没有意见”；蒙方认为不适宜留下工作的人员，中方则随时准备将其调动回国^⑤。

由于有了这些表态，蒙古政府对待中国援蒙工人与蒙古工人的争端时，往往不公平地对待中国工人。例如，1964年3月，乌兰巴托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有70名中国工人和40名蒙古工人打群架，蒙古警察到场后将其中的2名中国工人关入了

① AVPRF: fond 0100, opis 56, papka496, delo 8, from Sergey Radchenko, *The Soviets' Best Friend in Asia*, CWHIP, Working Paper, No. 42, Washington, D. C. November, 2003, p. 12.

② Brief vom Botchafter Speiser an Gen. Winzer, Ulan Bator 30. 11. 1961, PAAA, MFAA, C257/78.

③ 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工人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生产建设的协定》，1960年9月2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6-00151-03（1）。

④ 《中国与蒙古关于中国派遣工人参加蒙古生产建设的协定》，1955年4月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6-00017-02（1）。

⑤ 石绍湘《中蒙关系分析1949—1965》，外交学院2010年硕士论文，第23页。

牢房，却没有处理蒙古工人^①。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工人的罢工。1961年9月下旬，在乌兰巴托的一个工厂里，蒙古民兵出手攻击了一个中国工人，由此在这个工厂里导致了一场中国和蒙古工人之间的大斗殴，大约有60至80名工人参加。蒙古方面出动了警察才平息了争端。然而事情并未终结，随后工厂里所有中国工人进行了连续几天的罢工，并波及到了蒙古全境的中国工人。事件发生后，中国工人在工作中都显得心不在焉、半心半意^②。

在实际工作中，中国工人承建的工程项目质量上也出现了大量问题。这除了和中蒙出现矛盾的情况下很多工人无心工作有关外，也和工人自身的素质有关。很多工程要么没有完工，要么因中方施工问题导致在建成后不能正常工作。在五十年代两国两党关系良好的情况下，这些质量上的问题往往为顾全大局被忽视了。但当双方在意识形态上闹僵和党际国家关系出现矛盾的时候，这些问题迅速被放大，成为了用来指责对方的材料。蒙古人认为，“中国人承建的很多工程都质量低下”。例如，乌兰巴托的玻璃厂缺乏一些重要的自动设备。苏赫巴托尔省的发电厂和家具厂由于设备问题不能正常运转。而中方在援建乌兰巴托的纺织厂时，用的是从英国进口的设备，这就导致本来就缺乏外汇的蒙古必须从英国购买设备所需的零备件^③。

中国工人自身的素质和违法行为也在蒙古产生了消极影响。有的中国工人利用休假机会，从事走私和投机倒把的买卖。例如，有个中国工人在休假期间通过蒙古边防站时，被查获身上携带了25块手表、18枚金戒指和30颗珍珠。中国工人还大量走私羊毛制品和机械制品。1961年蒙古全国一共进口了12 000辆自行车，而中国工人就购买了其中的11 000辆，并将其卖回到中国^④。

尽管中蒙双方存在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但双方都不愿放弃在国家关系上的合作。对蒙古来说，这主要是为了避免使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停滞。1961年底，一名捷克斯洛伐克驻蒙大使馆的蒙古籍汽车司机与一个中国籍汽车司机由于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不同，从而发生了激烈的言语争执。这之后，蒙古政府迅速将其调离。蒙古外交部副部长索苏尔巴纳姆对捷大使表示，希望捷方能够理解蒙古在当前蒙中关系困难形势下的决定。苏联驻蒙大使甚至认为，这是中共对蒙古内政干涉的表现，而“蒙古同志在压力面前屈服了”^⑤。

① Aktenvermerk über eine Unterredung mit dem 2. Sekretär der Csl. Botschaft, Gen. Budil, am 16. 3. 1964, Ulan Bator, PAAA, MfAA, A7568.

② Brief vom Botchafter Speiser an Gen. Winzer, Ulan Bator 30. 11. 1961, PAAA, MfAA, C257/78.

③ Aktenvermerk über eine Besprechung mit dem 2. Sekretär der Mongolischen Botschaft, Gen. Naidanjav, und Gen. Jarck am 25. 9. 1964 in der Zeit von 15. 00 - 16. 30 Uhr, Hanoi, PAAA, MfAA, A7568.

④ Aktenvermerk über eine Besprechung mit dem 2. Sekretär der Mongolischen Botschaft, Gen. Naidanjav, und Gen. Jarck am 25. 9. 1964 in der Zeit von 15. 00 - 16. 30 Uhr, Hanoi, PAAA, MfAA, A7568.

⑤ 捷大使对蒙古方面的决定很不满，认为这名司机有很好的工作纪律和专业能力，甚至向捷克国内提出建议，要求动用高层的党际关系来解决这个问题。参见 Brief vom Botchafter Speiser an Gen. Winzer, Ulan Bator 30. 11. 1961, PAAA, MfAA, C257/78.

中苏分歧公开后,蒙古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站在苏共一方,中国开始大规模向蒙古抱怨蒙古公民、干部、军警、企业及机关等侮辱、殴打和非法逮捕中国员工的问题,以此向蒙古施压。中方认为,援蒙中国工人这些年在蒙古受到了巨大的不公平,乃至非人道的对待^①。1962年5月8日,周恩来驳回了蒙古驻华大使沙拉布对中国援蒙工人罢工问题的观点,还指出,“如果你们不需要,可以把他们送回来,但不要侮辱殴打他们”^②。而蒙古则指责中方在援蒙工人问题上政策的变化是,“利用这些细小的摩擦来制造所谓蒙古对中国不友好的证据,以证明蒙古对中方不友好”^③。

1963年4月至12月,中蒙两国就中国派遣劳工援蒙问题进行了47次会谈,但会谈都无果而终。在中国劳工问题上,蒙古曾提出在1964年5月援蒙劳工和约期满之后,延长至当年年底的建议。对此,中方提出了与既定的工人援助协定不同的三个条件。第一,援蒙的中国劳工需要将更多的收入寄回中国。第二,蒙古政府需要保证每个中国劳工的安全。第三,如果有中国劳工在援蒙期间死亡,蒙古方面应该承担将其尸体运回中国的费用。蒙古政府则认为,这三个条件中的最后一个条件让蒙古人回忆起了当初蒙古受中国管辖之时,中方所提过的类似要求,“今天的蒙古不能再接受这样的要求”^④。

久久未定的援蒙中国工人问题实际上对蒙古的经济建设非常不利。民主德国驻蒙使馆发现,当时蒙古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劳动力问题,“第3个五年计划所定下的兴建工业设施的目标只能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劳动力和专家的援助才能实现。但由于蒙古在意识形态问题斗争中的立场,中共在经济上对其施加了压力,例如减少了在蒙援建工人的数量。中共不会增加在蒙古援建的工人数量,但也不可能彻底撤回所有的工人,以保持其在蒙古的影响”。德方的评估认为,“在蒙古经济恶化的情况下,蒙古国内民众的意见和观点可能受到亲中国势力的操纵”^⑤。

从1964年4月份开始,蒙古将工作期限到期后仍在蒙古工作的6470名中国工人,连同其家属一起派专车送回中国^⑥。而双方在为何遣送这批中国工人回国的问题上也发生了争论。双方在宣传上都不承认本方在这个问题上理亏。中方认为,这

① 《中蒙政府经济工作组会谈记录》,1963年5月30日—6月2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6-00850-01。

② 《周恩来总理接见蒙古驻华大使沙拉布谈话交流》,1962年5月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6-01383-01。

③ Aktenvermerk über die Unterredung mit dem Minister für Auswärtige Angelegenheiten der MVR, Gen. Schagdarsuren, am 21. 11. 1961, Ulan - Bator 22. 11. 1961, PAAA, MfAA, C247/74.

④ Aktenvermerk über eine Besprechung mit dem 2. Sekretär der Mongolischen Botschaft, Gen. Naidanjav, und Gen. Jarek am 25. 9. 1964 in der Zeit von 15. 00 - 16. 30 Uhr, Hanoi, PAAA, MfAA, A7568.

⑤ Einschätzung über die gegenwärtige politische und ökonomische Situation in der MVR und über einige Probleme in der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MVR, Ulan - Bator 13. 5. 1963, PAAA, MfAA, G - A 327.

⑥ 《中蒙双方关于运送中国工人回国问题的会谈记录》,1964年4月1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6-01136-07。

些工人回国并非由于其在蒙劳动合同期满，而是由于蒙古政府的主动要求。蒙古不要中国的劳工，是因为想接收苏联的劳工。而蒙方则认为，之所以将这批人送回国是因为他们在蒙古的期限到当年5月份就到期了。蒙古向苏联求援，是因为中方先撤回了援蒙劳工^①。

对本来就严重缺乏工业劳动力的蒙古来说，撤离这些中国工人意味着蒙古工业发展计划会受到很大影响。按照蒙古人民革命党原定的第4个五年计划，蒙古将在这个五年计划的末期打下成为工农业国家的基础，并在未来的15至20年里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农业国家，赶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和生活水平。工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中的比重将在48比52左右。同时，由于自然原因，1964年蒙古的畜牧业受到重创。仅在戈壁阿尔泰省，全年就有45万头牲畜（该省共有145万头牲畜）因为严冬而死亡。而全蒙古有160万头牲畜死亡。因此，蒙古大幅减少了向外供应肉类、羊毛和动物毛发的数量^②。1964年蒙古还出现了大规模的肉类、面包、面粉和工业产品的供应困难问题。为此，苏联和民主德国向蒙古提供了大量消费品。求购帽子、衣料、鞋油的人们排成长队，以致必须要警察出面才能稳定秩序。民主德国驻蒙大使馆认为，蒙古的肉类供应现在相对较好，而“那也许是因为我们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从双边贸易订单中）没有拿得走的肉类现在被用来供应蒙古市场了”^③。中国工人撤离后，蒙古建筑业和交通运输领域出现了巨大困难，对蒙古政府来说，在这些领域要完成原先的计划成为了“难以想象的事情”^④。例如，乌兰巴托肉加工厂是蒙古近年来最大的经济建设项目，对其有重大意义。然而，由于蒙古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工厂不能按时完工^⑤。

三

边境问题是六十年代初中蒙另一个争议较大的领域。中蒙共同边界长达4000多公里，由于五十年代初双方是同志加兄弟的社会主义友好关系，尽管双方对边界有着各自的表述，双方并未对边境划界一事予以太多的关注^⑥。直到1960年代中苏分歧明显化，蒙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跟随苏共批判中共，中蒙党际和国家关系恶

① Erläuterung durch die Monzame, 12. 5. 1964, PAAA, MfAA, C247/74; Aktenvermerk über eine Besprechung mit dem 2. Sekretär der Mongolischen Botschaft, Gen. Naidanjav, und Gen. Jarck am 25. 9. 1964 in der Zeit von 15. 00 - 16. 30 Uhr, Hanoi, PAAA, MfAA, A7568.

② Aktenvermerk über eine Unterredung mit dem Stellv. Leiter der WPA der SU Botschaft, Gen. Sytschow, am 10. 11. 1964, Ulan Bator, PAAA, MfAA, A7568.

③ Brief von Willerding an Schneidewind, Ulan - Bator, 30. 1. 1965, PAAA, MfAA, A5552.

④ Vermerk über Gespräch beim Stellv. des Vorsitzenden des Präsidiums des Grossen Volkshurals der MVR, Gen. Luwsanrawdan bei der Akkreditierung am 9. 9. 1964, Ulan Bator, PAAA, MfAA, A7568.

⑤ Einschätzung über die gegenwärtige politische und ökonomische Situation in der MVR und über einige Probleme in der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MVR, Ulan - Bator 13. 5. 1963, PAAA, MfAA, G - A 327.

⑥ 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 - 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

化后,双方边境争端开始不断爆发。边境划界成为了中蒙两国急需解决的问题。

争端首先表现在双方都开始指责对方是边境问题的元凶,是对方“非法”越过了边界导致局势紧张。蒙古外交部长沙格达苏仁1961年11月指出,过去几个月来,“中国同志在边境上制造了巨大的问题”。过去在科布多(蒙古西部,毗邻中国新疆青河)附近的边境上很少有人员和牧群的来往。而过去几个月却出现了大量的中国猎人肆意穿越边境,肆无忌惮地射杀珍稀的野生动物(如野驴、野马和骆驼等)。同时,中国的牧群也跨越边境,被赶到蒙古境内的草原上放牧。当蒙古政府对此进行干预,收缴中国猎人的武器,并驱赶其回国时,中国政府却将这些行为视作蒙古对华“不友好态度”的体现。他认为,“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想制造一种紧张的气氛,并将全部责任都推到蒙古身上”^①。蒙古政府还告知东欧国家使馆官员,1961年全年,中国军队在中蒙边境上进行了89次侵犯,“目前甚至有一个村庄被中国军队占领”^②。

中国政府的表态则与蒙方争锋相对,认为责任完全在蒙古一方,而中方在边境问题上做到了极大的克制。1962年3、4月间,中蒙两国在中国新疆青河地区(毗邻蒙古科布多)的边境上发生纠纷。中方认为,这是“蒙古不顾中方屡次交涉,连续在中国青河地区大规模驱赶、殴打中方干部、牧民,强占中国耕地,甚至打伤17名边民。这些严重事件引起了中国的强烈抗议并加强了边防警戒”^③。由此,中方在4月14日提出了解决边境问题的三条原则意见:1、保持边境现状,维持各自传统管辖的放牧和生产活动的地区。2、严格遵守1953年有关一切边境的问题通过两国边防机关协商解决的协议。3、教育地方干部、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友好相处^④。

蒙古政府认为,中方其实在中蒙边境上无利可图,而是另有目的。1962年8月1日,蒙古外交部副部长索苏尔巴拉姆利用一份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的地图对民主德国大使描述了当时中蒙边境的情况。地图用记号标出了中蒙领土争议的地区。其中,中方对16700平方公里面积的领土提出了要求。中国所要求的领土中,除了个别区域,大都是没有经济和战略价值的沙漠地区。索苏尔巴拉姆认为,中国同蒙古的边境谈判是为中国同印度的边境谈判提供范例,有着非常大的政治宣传意图,是为了向印度展示“社会主义国家间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可以在中印之间适用”^⑤。

实际上,除了对印宣传外,中国还有着通过达成边界协定以在中苏分歧下争取蒙古的目的。因此,中蒙双方很快就在划界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从1962年10

① Aktenvermerk über die Unterredung mit dem Minister für Auswärtige Angelegenheiten der MVR, Gen. Schagdarsuren, am 21. 11. 1961, Ulan - Bator 22. 11. 1961, PAAA, MfAA, C247/74.

② Brief vom Botchafter Speiser an Gen. Winzer, Ulan Bator 30. 11. 1961, PAAA, MfAA, C257/78.

③ 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

④ 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02页。

⑤ Aktenvermerk über ein Gespräch mit dem Stellv. des Außenministers der MVR, Gen. Sossobaram, am 31. 8. 1962, Ulan - Bator, PAAA, MfAA, G - A327.

月 12 日开始谈判, 11 月 13 日就争议的土地划属问题达成了协议, 17 日签订了会谈纪要。蒙古政府认为, 这些地区尽管都是没有战略价值和经济意义的地区, 但却对蒙古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这是外蒙古 1911 年独立以来, 中国政府第一次承认了蒙古的边界、独立和国家主权, 并以官方条约的形式确定了下来。”^①

12 月 25 日, 蒙古首脑泽登巴尔自来华签署两国边界条约。他此次访华受到了中方的高规格接待。周恩来不但亲赴机场迎接, 两次与其在钓鱼台宾馆进行闭门会谈, 专门为其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 还陪伴泽登巴尔出席了由文化部和中蒙友协举行的音乐舞蹈杂技晚会以及首都各界为欢迎泽登巴尔、庆祝中蒙边界条约签订举行的万人大会^②。中国之所以如此高规格接待泽登巴尔, 并且很快签署两国边界条约, 目的首先是为了在中苏分歧中争取蒙古。其次是以此为榜样, 在中印边界冲突面前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是热爱和平的国家, 正如 12 月 27 日, 周恩来在出席欢迎泽登巴尔访华的晚宴时所指出的, “两国顺利解决边界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良好范例。中国政府始终不渝地主张通过友好谈判, 解决同邻国的边界问题, 不仅对兄弟国家是这样, 对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对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中国政府一直抱着同样的信念, 并且采取了一切可以设想的步骤”^③。

在边界条约签署后的第二天, 即 12 月 27 日的双方谈话中, 内容和气氛都显得比较紧张。周恩来直接对泽登巴尔指出, “中国人民不喜欢蒙古媒体只刊登苏联对中国的指责而忽视中方的言论。如果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 蒙古就可能失去中国对蒙经济援助, 包括撤回在蒙古各地援建的中国工人。由于我们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不一致, 我们的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都会受到影响”。而泽登巴尔则不为所动, 表示“我们党将继续同分裂国际共运的人做坚决斗争”, “不会因为 8000 名中国援蒙工人就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退却和改变我们党的正确路线”。周恩来随即谴责泽登巴尔在“盲目地跟随苏共”^④。

尽管蒙古党态度如此坚决地拒绝在中苏意识形态分歧中站在中国一方, 但还是带着签署中蒙边界条约的成果顺利回国。中蒙双方甚至曾经一度由于边界条约的签署而出现了短暂的和解气氛, 双方也都曾试图利用这样的机会继续发展双边关系。

① 民主德国驻蒙大使施派泽也认为, 同蒙古签订有关边境的条约是中国在其同印度的边境冲突面前, 急于以此为榜样, 宣传其和平外交的尝试。参见: Aktenvermerk über die Vorsprache beim stellv. Außenminister der MVR, Gen. Sossobaram, am 23. 11. 1962, Ulan - Bator, PAAA, MfAA, G - A327.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 1949—1975》,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345—346 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 1949—1975》,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346 页。

④ 这次对话如此激烈, 在场的蒙古驻华大使策伯格米德认为周和泽登巴尔甚至随时可能动手打起来。参见 AVPRF: fond 0100, opis 56, papka 495, delo 7, from Sergey Radchenko, *The Soviets' Best Friend in Asia*, CWIHP, Working Paper, No. 42, Washington, D. C. November, 2003, pp. 6 - 7.

蒙古政府还曾高规格地接待前来换约的中国代表团^①。1963年底,中国国家歌舞团来蒙古进行演出,蒙古《真理报》发表文章称赞了歌舞团的表演,并将其视作两国加强文化交流的机会。蒙古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几名部长都前往出席了演出开幕式,文化部长也对歌舞团进行了亲自接待。外交部副部长索苏尔巴纳姆私下表示,这么做是因为蒙古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国家间关系^②。

但好景不长,随着边界的划定以及与蒙古总体关系的不断恶化,中国在1963年6月前在中蒙边境新疆段增加了16个边境站和3个总站(增加了342人);在中蒙边境内蒙段增加了3个边境总站,9个边境站和11个工作组(增加了1234人);中蒙边境甘肃段也增加了1个总站,2—3个边境站(增加了120人)^③。而蒙古此时一方面在国内进行局部动员,建立了专门的岗哨用以监视中国人在边界的活动^④。另一方面也借助苏联增强了边境防御。1963年7月,尽管蒙古政府提出的加入华约组织的申请被拒绝,但却成功地成为了华约的观察员国家。同时,苏联同蒙古签订了《有关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此后,苏军派出许多勘探小分队,到蒙古铁路两侧及其以东的边境省份活动,他们都配备有野外通信电台车,成员均着便衣,对外声称是给草原找水,实际上是为苏军进驻勘察阵地^⑤。这些行动直接威胁到了中国的安全。

四

在经济领域,1961年之后中蒙双边贸易也大幅下降。中国对中蒙过境进行了限制,双方人员的过境数量只有1960年的25%^⑥。1964年初开始,中方不再准许蒙古通过中国的港口从日本、南斯拉夫等国进口商品和货物,并以防疫等理由不再允许蒙古向朝鲜和北越出口的产品过境^⑦。援蒙贷款和援建工人的缩减也直接影响了蒙古第3个五年计划(1961—1965)的开展。按照原先的协议,在蒙古的三五计划中,中国将总共援建33个工业项目。而到1963年底,只有3到4个项目得

① Der bevollmächtigte Vertreter der Regierung der VR China traf in Ulan - Bator ein, 1. 7. 1964, PAAA, MFAA, C274/74.

② Brief von Speiser an Gen. Schneidewind, Ulan - Bator, 6. 12. 1963, PAAA, MFAA, C247/74.

③ 《中央批转人民武装警察司令部关于中苏、中蒙边境地区边防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1962年6月2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18-01061-03。

④ “契尔沃年科与策伯格米德会谈纪要:中国试图离间苏蒙关系”,1964年10月7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十卷,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395页。

⑤ 孙一先《文革年代的中蒙关系》,载《纵横》2001年第1期。

⑥ Einschätzung zur Haltung der MVR zu den Meinungsverschiedenheiten und deren Auswirkungen auf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MVR und VR China, Berlin 13. 9. 1963, PAAA, MFAA, C257/78.

⑦ Aktenvermerk über eine Besprechung mit dem 2. Sekretär der Mongolischen Botschaft, Gen. Naidanjav, und Gen. Jarek am 25. 9. 1964 in der Zeit von 15. 00 - 16. 30 Uhr, Hanoi, PAAA, MFAA, A7568.

到了援助^①。

由于中蒙经济合作的停滞，蒙古加大了向苏联和经互会求援的力度。经过长期对蒙古在中苏分歧中的态度和中蒙关系的观察，苏联和民主德国等苏东阵营国家认为“蒙古是亚洲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与中国有着漫长的边境，从一开始在这个问题上就从未有过动摇和半点妥协，并坚定地同苏共和其他共产党站在一起”；“尽管我们党和国家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但我们认为，我们对蒙古的重视还没有达到其应有的程度”^②。蒙古政府在派人与中方探讨内蒙牧民援蒙的同时，还和苏联达成了六百万卢布的补充援助协定（以消费品的方式）。同时，本身拥有丰富矿藏的蒙古还以自身的煤矿尚未投产为由，成功迫使苏联答应向蒙古出口煤炭^③。而作为对中国工人的替代，蒙古政府也频繁要求苏联派遣苏联工人前来工作^④。

蒙古在1962年6月加入经互会，之后很快就提出了许多发展蒙古经济的建议。包括降低在蒙古工作专家的待遇，在外贸领域成立一个援助基金会。而如果这些不能实现，那就该提高蒙古出口产品的价格，或者改变货物运输及装配的一些规则。同社会主义国家就这些问题的协商会在1963年5月中下旬在东欧不同国家的首都进行^⑤。

在1963年9月的经互会国家协商会议上，蒙古代表表达了蒙古领导人对经互会扩大对蒙援助的“强烈愿望”，希望加强国民经济的协调与经济领域的合作^⑥。1964年9月12日，泽登巴尔同新任民主德国驻蒙大使维勒丁进行了谈话。泽登巴尔表示，蒙古党政治局已经做出决定，在民主德国建国15周年之际由他自己率团前往民主德国祝贺，之后他还将率团访问匈牙利和波兰。在民主德国，他期望同德方探讨蒙古正在准备的第4个五年计划（1966 - 1970）的问题。在同民主德国的经济合作上，泽登巴尔准备向德方领导同志提出贷款援建肉加工厂的问题，因为当前蒙古的经济和外贸形势不可能使得该工程有所进展^⑦。

在蒙古政治经济全方位向苏东阵营靠拢后，中蒙双方的互不信任进一步加剧，

① Information über die Haltung der MVR zu den Meinungsverschiedenheiten mit den chinesischen Führern nach der Unterzeichnung des Moskauer Vertrages, Ulan Bator, 14. 10. 1963, PAAA, MfAA, C247/74.

② Brief vom Rommel an Bruno Mahlow, Ulan Bator, 27. 7. 1963, PAAA, MfAA, C247/74.

③ Aktenvermerk über eine Unterredung mit dem amtierenden Leiter der 1. Abteilung im MfAA der MVR, Gen. Lchundew, am 12. 10. 1964, Ulan Bator, PAAA, MfAA, A7568.

④ “洛马科与泽登巴尔会谈纪要：希望苏联工人接替中国工人”，1963年9月13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十卷，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239页。

⑤ Einschätzung über die gegenwärtige politische und ökonomische Situation in der MVR und über einige Probleme in der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MVR, Ulan - Bator 13. 5. 1963, PAAA, MfAA, G - A 327.

⑥ Information über die Haltung der MVR zu den Meinungsverschiedenheiten mit den chinesischen Führern nach der Unterzeichnung des Moskauer Vertrages, Ulan Bator, 14. 10. 1963, PAAA, MfAA, C247/74.

⑦ Vermerk über Antrittsbesuch des Gen. Willerding beim 1. Sekretär des ZK der MRVP und Vorsitzenden des Ministerrates der MVR, Gen. Zedenbal, am 12. 9. 1964, Ulan - Bator, PAAA, MfAA, G - A 327.

一些看似不起眼，并且实际上没有恶意或目的的行动和表态都被对方视作是挑衅，从而引起了争执。例如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社会党代表时指出，“我们曾经提出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就是同赫鲁晓夫、布尔加宁提的。在1954年他们访问中国的时候”^①。实际上，此时中方既然已和蒙古签署了边境条约，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想表示真正威胁蒙古独立的是苏联，而并不想对蒙古重提领土要求。10月，陈毅就曾对访华的蒙古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鲁布桑表示，“中蒙两国是独立的国家，并且还签署了边境协定，所以（中蒙）边境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②。

但此番讲话却被蒙古利用来指责中方。在日本媒体披露该讲话后，蒙古驻华使馆随即在7月24日要求中方作出澄清和解释。蒙古外交部长认为，中方在和日本做交易，旨在日苏领土争端中支持日本，并换取日方在中国对蒙古和苏联的领土要求上的支持^③。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更批判中方的政策是“以前统治中国政权的反动政策的继续”。他向民主德国外交官员指出，蒙古也长期存在过要求把内蒙古并入的声音，但“我们曾经认为，那里也在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那才是最重要的”，而“今天我认为（把内蒙古并入的）提法更加合理了”^④。1965年9月，蒙古在纪念战胜日本20周年出版物中，还出现了将内蒙和中国并列的情况^⑤。

1964年6月，两名正在蒙古劳改营服刑的中国人之间发生矛盾，其中一名中国人拿起石头砸死了另一名。但这样的事却震动了中国驻蒙使馆的神经，要求蒙古外交部和当地政府对此作出解释。最终蒙古政府答应了中方验尸的要求，但没有让中国使馆人员参观劳改营。对此事件，蒙古外交部副部长索苏尔巴纳姆认为，“尽管事实确凿，但中国人现在到处制造声势，企图把所有责任嫁祸到蒙古政府身上”^⑥。

蒙古国内的民族主义此时也再度高涨。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群体内，出现了非常

① 《毛泽东主席接见佐佐木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日本社会党中、左派人士谈话记录》，1964年7月1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105-01897-01。参见石绍湘《中蒙关系分析1949—1965》，外交学院2010年硕士论文，第49页。

② Mongol Ulsyn Zasglin Gazryn Arkhiv（蒙古政府档案馆），Fond 1，tovyog 16，kh/n 299（1965），pp. 92-98，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2517 引用日期：2014年7月5日。

③ Aktenvermerk über Antrittsvisite des Gen. Willerding beim Aussenminister der MVR，Gen. Dugersuren，am 8.9.1964，Ulan Bator，PAAA，MfAA，A7568。

④ Aktenvermerk über Gespräch mit Gen. Adilbisch，Vorsitzender des Exekutivkomitees der Freundschaftsgesellschaften und den Abteilungsleiter für Agitation und Propaganda beim ZK，Gen. Otschirbat，am 8.9. Und 9.9.1964，Ulan Bator，PAAA，MfAA，A7568。

⑤ 石绍湘《中蒙关系分析1949—1965》，外交学院2010年硕士论文，第44页。

⑥ Vermerk über die Vorsprache beim Amtierenden Aussenminister，Gen. Sosorbaram，am 16.6.1964，Ulan Bator，PAAA，MfAA，A6578。

剧烈的民族主义思潮。这些人提倡成吉思汗式的泛蒙古主义，并利用蒙古在物资供应上出现的困难局面，在蒙古社会和党政机关内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在和泛蒙古主义分子谈话时，蒙古党政机关常常用中国威胁和中国在内蒙古对蒙古人的强迫同化行为做主题，从而取得这些人对蒙古党对华政策的认同（这些知识分子往往会坚决反对中国在内蒙古的做法），同时也借此说明泽登巴尔政策的正确性，衬托蒙古所取得的成就大都是在苏联的帮助和支持下获得的^①。

1966年1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访问蒙古。在这次访问中，泽登巴尔成功说服勃列日涅夫对蒙古进行军事援助。随后，苏蒙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条约承诺，“将动用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捍卫两国的安全和独立”。《条约》标志着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新领导层正式放弃了寻求与中国的和解，转而遏制中国^②。由此也将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的前哨推进到了距中国首都北京仅几百公里的地方，直接构成了对中国的军事威胁^③。

五

1960年中苏分歧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公开扩大后，蒙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甚至在苏共和东欧共产党之前对中共进行了攻击，但为了借助中国的援助将蒙古建设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蒙古在国家关系领域并不想中断与中国的合作。我们从档案中可以看到，六十年代蒙古政府在依靠和利用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反对中国时，又时刻不忘遏制这种民族主义思潮的过度膨胀，以免有损于蒙古党的中国政策、苏蒙关系以及作为“国际主义”宣扬者的蒙古党对蒙古的统治。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蒙古外交政策在中苏分裂背景下具有一定的主动性。

在双方陷入意识形态争论的情况下，中国为了分化蒙苏关系，争取蒙古的支持，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对蒙施加了压力。然而这些措施并未见效，还促使蒙古主动寻求苏联和苏东阵营国家的援助，与中国渐行渐远。在这个过程中，蒙古先后成为经互会成员国、华约组织观察员国，同苏联和苏东阵营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越发紧密，到最后签署《友好合作互助条约》邀请苏联驻军蒙古，成为了中国北部边境最大的威胁。

(责任编辑：郭雷庆)

① Vermerk über einige Fragen aus Gesprächen und Veranstaltungen mit mongolischen Partei- und Staatsfunktionären anlässlich meines Ausscheidens aus Ulan Bator, Berlin 22. 9. 1964, PAAA, MfAA, A7568; Aktenvermerk über eine Unterredung mit dem Gen. Shagwaral, Sekretär des ZK, am 18. 8. 1964, Ulan Bator, PAAA, MfAA, A7568.

② Sergey Radchenko, *Two Suns in the Heavens, The Sino-Soviet Split for Supremacy, 1962-196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61-162.

③ 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